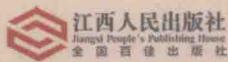


类书

何春根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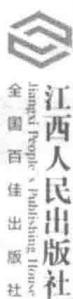
与中国古代小说研究



类书

与中国古代小说研究

何春根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类书与中国古代小说研究 /何春根著.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8. 12

ISBN 978 - 7 - 210 - 10983 - 9

I. ①类… II. ①何… III. ①百科全书 - 研究 - 中国 - 古代 ②古典小说 - 小说研究 - 中国 IV. ①Z22; I207. 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70839 号

类书与中国古代小说研究

何春根 著

责任编辑:涂如兰

封面设计:何冰清

出版:江西人民出版社

发行:各地新华书店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三经路 47 号附 1 号

编辑部电话:0791 - 86898965

发行部电话:0791 - 86898815

邮编:330006

网址:www. jxpph. com

E - mail:jxpph@ tom. com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201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mm × 1092mm 1/16

印张:19. 5

字数:320 千字

ISBN 978 - 7 - 210 - 10983 - 9

定价:48 . 00 元

承印厂:北京虎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赣版权登字—01—2018—924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内容简介

类书和小说是两种不同的著述形式，但彼此之间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类书里包含大量的小说内容，因此可以用来对古代小说进行校勘和辑佚。同时，类书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古代小说的创作与传播，尤其在传播价值方面，它是古代一些小说得以流传至今的重要载体，被很多学者所关注，并得到善加利用。用类书研究中国古代小说，是一种较为独特的视角和方法。其价值或可进一步挖掘。本书主要包含两个问题的研究，即“类书与中国古代小说关系的研究”与“小说类书研究”。



作者简介

何春根，男，1971年生，江西南城人。2003年毕业于江西师范大学文艺学专业，师从饶龙隼先生，获硕士学位；2014年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师从孙逊先生，获博士学位。现为江西九江学院副教授，兼职硕导，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和语文教育研究。主持国家社科、教育部、高校人文等课题。

目录

绪论	(1)
一、类书的缘起及特征	(1)
二、类书作为研究视角的价值	(7)
三、本课题研究的两个内容	(12)

上编 类书与中国古代小说的关系研究

第一章 类书与中国古代小说的关系总论	(16)
第一节 传统类书的编撰意图与对小说的征引	(16)
一、传统类书的编纂意图与小说征引	(17)
二、传统类书征引小说内容的特点	(20)
三、传统类书征引小说的三种方式	(23)
第二节 类书与中国古代小说的传播	(25)
一、类书与亡佚小说	(26)
二、传统类书与小说传播	(29)
三、通俗类书与小说传播	(30)
四、小说类书与小说传播	(34)
第三节 类书与中国古代小说的编创	(40)
一、小说创作取材类书	(41)
二、小说体例取径类书	(46)
第二章 类书与唐前及唐代小说保存与传播	(50)
第一节 类书与“雅爱搜神”的志怪传统	(50)
一、类书对志怪小说的两种态度	(51)



二、类书征引志怪小说的规律	(53)
第二节 类书与志人轶事小说	(67)
一、类书与唐前志人小说	(67)
二、类书与唐宋轶事小说	(69)
第三节 类书与唐传奇	(77)
一、类书中唐传奇的存在形态	(77)
二、类书中的唐传奇异本现象	(81)
三、类书的类目与唐传奇的题材	(84)
四、类书编撰与唐传奇的批评意识	(87)
第三章 类书与宋元小说由雅趋俗倾向	(89)
第一节 类书与宋元小说的整理与俗化	(89)
一、类书对文言小说的整理	(90)
二、通俗类书与小说的渐趋俗化	(90)
第二节 宋元类书中的文言小说	(92)
一、宋初类书征引小说的特点	(92)
二、宋末类书征引小说的特点	(96)
第三节 类书与宋元话本	(99)
一、《永乐大典》中的宋元话本	(99)
二、从类书看《快嘴李翠莲记》的写作时间	(104)
第四章 类书与明代小说的全面兴盛	(109)
第一节 《朱翼》辑引明代通俗小说	(110)
一、辑引《三国演义》“青梅会”考略	(111)
二、《水浒传》评语佚文两则	(115)
三、对明代通俗小说的评论	(116)
第二节 日用类书与明代小说的关系	(119)
一、日用类书与三国故事的民间接受	(120)
二、日用类书与《水浒传》的民间接受	(124)
三、日用类书与《金瓶梅》的世俗世界	(127)
第三节 通俗类书与明代中篇传奇	(129)
一、消闲类书：明代中篇传奇传播的主要载体	(131)
二、消闲类书与中篇传奇的俗化	(133)

三、消闲类书是中篇传奇传播的重要途径	(136)
第四节 类书与公案小说集的编纂	(139)
一、法书与明代公案小说集的编纂	(140)
二、明代公案小说集的类书特征	(143)
第五章 类书与清代小说的繁荣	(147)
第一节 类书与王刻本《聊斋志异》	(150)
一、王金范刻本的特点	(150)
二、王刻本的评价问题	(157)
第二节 类书与才学小说	(161)
一、才学小说作者学问淹通	(161)
二、类书与才学小说的同质性	(163)
第三节 明清小说中的类书及其文学功能	(171)
一、明代小说中的类书	(171)
二、清代小说中的类书	(173)
第四节 《清稗类钞》与明清小说论	(175)
一、小说本事论	(176)
二、小说艺术论	(180)
三、小说作家论	(182)

下编 小说类书研究

第六章 唐前及唐代小说类书的萌芽	(186)
第一节 唐前准小说类书考辨	(186)
第二节 唐代小说类书	(191)
第七章 宋元小说类书的毓兴	(196)
第一节 《太平广记》的分类特点	(197)
第二节 宋元小说类书类型	(207)
第八章 明代小说类书的繁盛	(216)
第一节 志异类小说类书	(216)
第二节 志人类小说类书	(219)
第三节 传奇类小说类书	(224)



第四节 综合性小说类书	(226)
第九章 清代、民国小说类书的衰歇	(232)
第一节 清代、民国小说类书的种类	(232)
第二节 清代、民国小说类书的体式	(240)
结语	(244)
附录一：古代小说类书叙要	(247)
附录二：部分亡佚小说辑注	(289)
参考文献	(296)

绪论

类书和小说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著述体式。一般来说,类书注重客观编排,是资料的汇编;小说重在虚妙生文,是“丛残小语”,是故事。类书最主要的特征是“因类立义”,而小说的重要要素是情节和人物形象。但在中国古代图书编刻史上,这两者又有割不断的联系。在稗史不分的时代,小说(尤其是宋前笔记体小说)往往是类书重要的取材对象,小说亦借类书得以保存和传播。因此,通过类书研究古代小说发展的规律、形式和内容,是一个较好的研究视角。

一、类书的缘起及特征

1. 类书的缘起问题

从目录学的角度看,《旧唐志》是首次在图书分类上列出“类书类”的,并著录类书二十二部,依次为《皇览》一百二十二卷又八十四卷、《类苑》一百二十卷、《寿光书苑》二百卷、《华林遍略》六百卷、《修文殿御览》三百六十卷、《长洲玉镜》一百三十八卷、《艺文类聚》一百卷、《北堂书钞》一百七十三卷、《要录》六十卷、《书图泉海》七十卷、《检事书》一百六十卷、《帝王要览》二十卷、《玉藻琼林》一百卷、《玄览》一百卷、《累璧》四百卷、《碧玉芳林》四百五十卷、《策府》五百八十二卷、《玄门宝海》一百二十卷、《文思博要》并目一千二百一十二卷、《三教珠英》并目一千三百一十三卷,凡七千八十四卷。《旧唐志》所列诸部,都是非常典型的类书,卷帙浩繁,动辄成百上千卷,而且从书名来看,所谓的“苑”“聚”“林”“海”等之类的词,都说明了这种书籍内容丰富,材料广泛,几乎无所不包。

在《旧唐志》所列的类书中,《皇览》被排在了最前面,说明它被公认为历史上的第一部类书。明代的王应麟在《玉海》中沿袭了这种观点,并且明确指出:

“类事之书，始于皇览。”其语云：

《魏志》：文帝好学，黄初中，散骑侍郎刘劭等受诏，集五经群书，以类相从，凡千余篇，号曰《皇览》。《魏略》：常侍王象受诏撰《皇览》，使象领秘书监。象从延康元年始撰集，数岁成，藏于秘府，合四十余部，部有数十篇，通合八百余万字。《隋志·杂家》：《皇览》一百二十卷，缪卜等撰。何承天合一百二十三卷，徐爰合五十卷，目四卷，梁萧琛抄二十卷。《唐志》：何承天并合《皇览》一百二十二卷，徐爰并合《皇览》八十四卷。类事之书始于皇览。^①

“类事之书，始于《皇览》”之论，此后在明清著述家中渐成通识，清代四库馆臣撰写各种类书提要时，也多次申述了这种观点。但是，像《皇览》这种类书是不可能突然出现的。实际上从宋代以来就有学者对类书的起源问题进行过争论，有的人把类书起源推至西汉甚至更早。关于这些争论，孙永忠概括了六个有代表性的意见：①《尔雅》说，张舜徽持论；②《吕氏春秋》说，汪中持论；③《淮南子》说，以钮树钰为代表；④《洪范五行传论》《新序》《说苑》说，以袁逸为代表；⑤《皇览》说，以王应麟为代表；⑥《同姓名录》说，以晁公武为代表。^② 王应麟的说法得到更多人的认可。

《皇览》虽基本被认为是第一部类书，但类书形成的原因却可以远溯到《皇览》成书之前。

首先要提到的是汉魏时期盛行的抄撰、抄撮之风。在两汉和南北朝时期，书籍雕版技术尚未发明，这个时期的人为了学习的方便，或博览，或藏书，或增才，都喜欢抄撮群书然后汇聚成册。但如果抄撮的材料越积越多的话，就要考虑以何种方式来编排材料了，否则就杂乱不堪，起不到任何简便阅览的作用。这就是关于书籍编纂的问题了。如《隋书》卷三十三曰：“自后汉已来，学者多钞撮旧史，自为一书，或起自人皇，或断之近代，亦各有志，而体制不经。”^③ 很明显，按类编排是最有效率的编纂方式。相同或近似的事类编集在一起，就是所

① (宋)王应麟《玉海》，四库全书本。

② 孙永忠《类书渊源诸说浅论——以〈尔雅〉与〈吕氏春秋〉为范围》，《励耘学刊(文学卷)》2006年第2期。

③ (唐)魏征等《隋书》(四)，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962页。

谓的“隶事”。曹之《中国古籍编撰史》说：“抄撰之作的影响是深远的，它形成了古籍中的两大门类——类书和史钞。类书的形成，先之以抄撮之力，继之以编撰之功，也是一种抄撰之作。”^①程千帆、徐有富《校雠广义·目录编》：“除了抄撰之外，南北朝亦盛行隶事之风。所谓‘隶事’即把同类事物汇集在一起。”^②《隋志》中著录了《杂事钞》二十四卷、《杂书钞》四十四卷、《子抄》三十卷、又《子抄》二十卷、《书钞》一百七十四卷等，都是抄纂之风的结果。在《隋志》里，这些书钞类的图书今已亡佚，我们现在虽然不能完全知道它们的属性，但既然和《皇览》《华林遍略》等类书著录在一起，说明它们也应该是具有类书性质的，或者说接近类书的模样了。它们就是类书萌芽时期的形态。

关于抄书和隶事之风还有一则趣闻，《南史·王摛传》载：

尚书令王俭尝集才学之士，总校虚实，类物隶之，谓之隶事，自此始也。俭尝使宾客隶事，多者赏之。事皆穷，唯庐江何宪为胜，乃赏以五花簾、白团扇。坐簾执扇，容气甚自得。摛后至，俭以所隶示之，曰：“卿能夺之乎？”摛操笔便成，文章既奥，辞亦华美，举座皆赏。摛乃命左右抽宪簾，手自掣取扇，登车而去。^③

这种抄撰风气至宋犹然，叶梦得《避暑录话》载：“殊（指晏殊）平生未尝弃一纸，虽封皮亦十百为沓，每读书得一故事，则批一封皮。后批门类，命书吏传写，即今《类要》也。故所载皆从原书采掇，不似他类书互相剽窃，辗转传讹。然自宋代所传名目，卷帙已多互异。”^④由此可见学者的读书和抄书，自古皆然。类书的形成是抄书之风的必然结果。

其次，类书的形成可能还跟人与生俱来的类分意识有关。之所以说是与生俱来的，因为这种意识是先验的，无须刻意学习或训练就会产生。

物质世界虽然纷繁复杂，但总有规律可循。不断积累起来的丰富的生活经验，使先民早就意识到可以运用类分的办法对周围的事物进行认识和感知，从而逐渐获得理性的知识，如宋李杞《用易详解》曰：“君子以类族辨物，类其族而

^① 曹之《中国古籍编撰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3页。

^② 程千帆、徐有富《校雠广义》，齐鲁书社1998年版，第96页。

^③ (唐)李延寿《南史》，中华书局1975年，第1213页。

^④ (宋)叶梦得《避暑录话》，转引自《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第1161页。

使不相杂,辨其物而使不相乱。”^①程千帆、徐有富《校讎广义·目录编》曰:“我国先民早已形成了对客观事物分类的观点,如《周易·系辞》:就有‘方以类聚,物以群分’的名言。”^②该书还进一步提到了《荀子》之《正名》及《王制篇》在逻辑思维上的类推方式的言论,如《王制篇》谈到:“以类行杂,以一行万。”

西方也有类似的论调。德国哲学家卡西尔《人论》第八章《语言》说:“分类是人类言语的基本特性之一。命名活动本身即依赖于分类的过程。给一个对象或活动以一个名字,也就是把它纳入某一类的概念之下。”^③美国人郝大维、安乐哲合著《期望中国:对中西文化的哲学思考》说:

“在中国的概览手册中,对于自然现象之客观描述表现出极少的兴趣。所关注的是类比的分类。而且这一关注尤其集中于这样一种关系:世界的种种内容与形成人类关于世界的经验的社会的、文化的价值之间的关系。作为一个例子,梁从诫指出,太平御览共有 55 个部,其中帝王、皇亲、官员、人事、祖先、礼仪这 6 部就占据了该书的 35% 的篇幅。

中国的类书是有等级的,尽管这种等级不是立足于种属的划分或是抽象形式的原则。人被有意识地安排在中心。但是,这里的‘人’并非先验的人性,而是指特定朝代的中国人,他被嵌牢在一套特殊的历史环境中。类书显示的是我们所谓的‘伦理的’或‘美学的’而非‘逻辑的’组织原则。单个的条目以最‘尊贵的’人开始,止于最‘底层的’;动物始于‘狮子’和‘大象’,止于‘老鼠’和‘狐狸’;树始于‘松树’和‘柏树’,止于‘蘋’和‘刺藤’。”^④

郝大维、安乐哲两人不仅饶有兴趣地谈到了中国古代人比较擅长的分类思维,甚至还精确地指出了中国类书中所体现的等级秩序,以及“伦理的”或“美学的”组织原则。中国古代的类书虽然不太符合西方人以“逻各斯”至上的知识系统,但具有独特的价值判断。

^① (宋)李杞《用易详解》卷四,四库全书本。

^② 程千帆、徐有富《校讎广义》,齐鲁书社 1988 年版,第 106 页。

^③ (德国)恩斯特·卡西尔著,甘阳译《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11 页。

^④ (美国)郝大维、安乐哲合著,施忠连译《期望中国:中西哲学文化比较》,学林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306 页。

2. 类书的定义及特征

由于类书是钞撮而成,所以内容比较广博且庞杂,具备“杂”的性质,故类书也常被一些书志编入“杂家类”,如《隋志》因无“类书类”的名目,便将《皇览》列入杂家。甚至在清代还有重蹈故辙的,《四库全书总目》按照所记内容和编纂形式,将“杂家”分为六类:第一类是“以立说者,谓之杂学”;第二类是“辨正者,谓之杂考”;第三类是“议论而兼叙述者,谓之杂说”;第四类是“傍究物理,胪陈纤琐者,谓之杂品”;第五类是“类辑旧文,途兼众轨者,谓之杂纂”;第六类是“合刻诸书,不名一体者,谓之杂编”。依据给出的解释来看,第五类“杂纂”是类书,而第六类“杂编”是丛书,却统统被归属为杂家。

尽管如此,《皇览》与一般的杂凑成书又存在明显不同,它是分类的,或者说,《皇览》因分类而变得有条理。诚如《荀子·王制篇》所云,它是“以类行杂。”^①郑樵《通志·校讎略》云:“类书,犹持军也。若有条理,虽多而治;若无条理,虽寡而纷。类例不患其多也,患处多之无术耳。”^②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四“类书类”撰《语丽》提要亦云:“梁湘东王功曹参军朱澹远撰。采摭书语之丽者,为四十门。按:前志但有杂家而无类书,《新唐书志》始别出为一类。此书乃犹列杂家,要之实类书也,但其分门类无伦理。”^③类书之“杂”,可以通过“类”的形式显示秩序与规范。

其实早在晋荀勗《中经簿》就已意识到《皇览》的不同。《中经簿》以甲乙丙丁四部序分图书,但丙部又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四类。余嘉锡对此进行了比较清楚的辨别:“史记、旧事即故事,杂事即杂史。皆史也,而皇览簿则非。”并旁注:“《皇览》乃类书之祖,《隋志》言梁有六百八十卷,故能以一书自为一类。”^④因此,《旧唐志》开列“类书类”,继承了前人的思维,其意义在于,在目录学上首次给了《皇览》真正比较合适的位置,将《皇览》实际上列为类书的开山之作。

而同样在《旧唐志》中,《新序》《说苑》被列入“丙部子录·儒家类”,《尔雅》被列入“甲部经录·小学类”,《吕氏春秋》《淮南子》被列入“丙部子录·杂家类”,《同姓名录》被列入“乙部史录·杂传类”。《同姓名录》成书于《皇览》

^① (清)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63页。

^② (宋)郑樵著,王树民点校《通志二十略》,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805页。

^③ (宋)陈振孙著,徐小蛮、顾美华校点《直斋书录解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423页。

^④ 余嘉锡《余嘉锡说文献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38页。

之后，暂可置而不论，其他几部图书，如衡之以类书特征，确实均与类书不合。

关于这个问题，今人于大成论述精详：

所不同者，厥为类书止是钞纂材料，而《吕览》与《淮南》则为一家之言，具有中心思想。《吕氏春秋》的中心思想，胡适之先生说，都在《本生》、《重己》、《贵生》、《情欲》数篇里发挥的一种很健全的个人主义。而《淮南子》，则高诱叙云：“其旨近老子，淡泊无为，蹈虚守静，大较归之于道。”又一般类书，仅钞录旧文，不加组织，而《吕览》、《淮南》则取所辑得的材料，组织成为首尾完具脉络分明的单篇文字。此其不同也。^①

另外，类书不以阐述思想为旨归，就是闻一多所讲的“采事而忘意”^②。而《吕氏春秋》《淮南子》《说苑》《新序》等却都是有“中心思想”的，与类书的编纂颇异其趣。

那什么是类书？不同的学者给出的定义都不太一样，章学诚《文史通义》曰：“纂组经传，摘抉子史，譬医师之聚毒，以待应时取给；选青妃紫，不主一家，谓之类书。”^③《中国类书总目初稿·郑序》说：“凡摘自古书，缕析条分，依类或按韵编，抄撮成书，以为采摘事文，供临文獭祭之用者，均是类书。”^④张涤华定义为：“类书为工具书之一种，其性质实与近世辞典、百科全书同科，与子、史之书，相去秦越。语其义界，则凡荟萃成言，褒次故实，兼收众籍，不主一家，而区以部类，条分件系，利寻检，资采掇，以待应时取给者，皆是也。”^⑤说法虽有差异，但概括起来，所谓的类书就是摘抄往籍按类编次的书籍，其特征有如下几点：第一，摘抄前书，一般不主张自撰，基本是“述而不作”，同时须标明出处；第二，必须按照一定的方式分门别类；第三，适宜于查找之备用；第四，便阅览，广见闻，不明显表达编纂者的思想，明代之前的类书尤其如此。这四点特征中，尤其以一二两点是最主要的。

^① 于大成《谈类书》（上），《出版家杂志》，1976年第50期，第106页。

^② 闻一多《唐诗杂论》，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96页。

^③ （清）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50—651页。

^④ 庄芳荣《中国类书总目初稿》，台湾学生书局1983年版，首第4页。

^⑤ 张涤华《类书流别》（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4页。

二、类书作为研究视角的价值

历史上类书的数量极其惊人,但鄙薄者亦有之,而且由来已久。清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一说:“元明之际,以制义取士,古学几绝,而有明三百年,四方秀艾困于帖括,以讲章为经学,以类书为博闻,长夜悠悠,视天梦梦,可悲也夫!”^①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三“内篇三”也感叹类书的编纂之害:“呜呼!著作衰而有文集,典故穷而有类书。学者贪於简阅之易,而不知实学之衰;狃於易成之名,而不知大道之散。”^②让这些硕学大儒非常不满的是,以经学为主体成分的实学逐渐衰落下去,代之而起的是空疏、简易的帖括之学,也就是科举制艺。而类书一个主要的功能就是对科举考试推波助澜。

这种不满在书志目录的编制上也得到体现。一般而言,凡是被认为没什么价值的著述一般都放在类书里,或者无法具体分类的也归为类书,其实就相当于杂类。如郑樵《通志略·校讎略》曰:“如《岁时广记》百十二卷,《崇文总目》不列于岁时而列于类书,何也?类书者,谓总众类不可分也,若可分之书,当入别类。且如天文有类书,自当列天文类,职官有类书,自当列职官类,岂可以为类书而总入类书类乎?”^③《崇文总目》的目录分四部:经部包括易、书、诗、礼、乐、春秋、孝经、论语、小学;史部包括正史、编年、实录、杂史、伪史、职官、仪注、刑法、地理、氏族、岁时、传记、目录;子部包括儒家、道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兵家、类书、算术、艺术、医书、卜筮、天文占书、历数、五行、道书、释书;集部包括总集、别集、文史等。四部当中的每一个细类都是有具体内容的,指向性非常明确。按郑樵意见,如果一部书不能入于一个具体的类目,就放在类书。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十二亦作如是观,其撰《农家类齐民要术》提要云:“右元魏贾思勰撰。记民俗、岁时、治生、种莳之事,凡九十二篇。农家者,本出于神农氏之学。孔子既称‘礼义信足以化民,焉用稼’,以诮樊须,而告曾参以‘用天之道,分地之利,为庶人之孝’,言非不同,意者,以躬稼非治国之术,乃一身之任也。然则士之倦游者,讵可知乎?故今所取,皆种艺之书也。前世录史部中有岁时,子部中有农事,两类实不可分,今合之农家。又以

^① (清)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页。

^② (清)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97页。

^③ (宋)郑樵著,王树民点校《通志二十略》,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816页。

《钱谱》置其间，今以其不类，移附类书。”^①《四库全书总目·类书类》序谓：“类事之书，兼收四部，而非经非史非子非集，四部之内，乃无类可归。”^②无论是郑樵、晁公武还是四库馆臣，都是正统学者，他们对类书的论述有点轻视意味。

造成这种偏见的原因有很多，比如受正统学术眼光的局限、类书编纂粗疏以致质量不高等等。但是，类书作为一种研究视角，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方面的价值还是很大的。其价值约略有三：

其一，校勘小说。校勘是古籍文献整理的重要方法之一，通过校勘，力求无限接近其原本的真实面貌。

校勘的重要性，文献学专家深有体会，王叔岷说：“校书虽为愚事，而实治学之本也。何以明之？我国古籍，秦灭以后，代有散亡，即或求而复出，得之先后不同，存者多寡亦异，虽经先儒整理，又难免改文从意，其间错杂窜乱，盍可胜纪？虽未经散亡之书，亦以钞刊流传，辗转致讹。如篆、隶、正、草、俗书之相乱，六朝、隋、唐写本之不同，宋、元、明刻本之各殊。淄渑并泛，准的无依。鼠璞同呼，名实相悖。夫研读古籍，必先复其本来面目。欲复其本来面目，必先从校讎入手。”^③小说作为“丛残小语”“小道”，在历史上经常不受重视，这就给小说的保存和流传带来极大的厄运，小说经常处于流失、散佚的状态。唐前的小说《世说新语》还算幸运，散佚并不严重，《搜神记》则是明人的辑佚之作。《搜神记》的各篇排列是否是今天看到的这个样子暂且不说，即使某些篇章的字句方面亦存在不同版本。这都需要校勘的努力。

由于类书是辑录文献而成，在一定程度上保存了较早的文献版本，所以能够作为校勘时的重要文献依据。利用类书进行校勘，宋、明时人已兆其端，至清时则更为常见。汪辟疆鄙视类书，但对类书的校勘价值还是给了非常客观的评价：

类书品格最下，通人恒不重视。然阅时既久，古籍日亡，而前代类书，反为考订辑佚所取资，其重视又不亚于经史，此可怪也。今《皇览》《华林遍略》《修文御览》，皆已久佚。唐宋间类书之获存者，如《北堂书钞》《艺

^① (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527页。

^② (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141页。

^③ 转引自潘树广、黄镇伟、涂小马《文献学纲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7—208页。